

Валентин
РАСПУТИН
幻象

—— 拉斯普京新作选

© 任光宣 / 刘文飞 / 译

В. Распутин

ВЕНТ
РАСПУТИИ

幻象

——拉斯普京新作选

© 任光宣 / 刘文飞 /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幻象·拉斯普京新作选 / (俄罗斯) 拉斯普京著;
任光宣, 刘文飞译.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2
ISBN 7-02-004358-5

I. 幻… II. ①拉…②任…③刘…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俄罗斯 - 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6617 号

责任编辑: 刘引梅

责任校对: 王玉川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幻象—拉斯普京新作选

Huan Xiang - La Si Pu Jing Xin Zuo Xuan

(俄罗斯) 拉斯普京 著

任光宣 刘文飞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50 千字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 插页 2

2004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ISBN 7-02-004358-5/I·3312

定价 23.00 元

前 言

二十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一批俄罗斯作家的注意力转向俄罗斯农村,真实地描绘了俄罗斯农村的现实,深刻地描绘出俄罗斯农村居民的精神的、道德的和心理的面貌,塑造出一大批血肉丰满的文学形象。俄罗斯文学界称这批作家为“农村题材”作家,俄罗斯的“农村题材”作家的文学创作取得了斐然的成绩,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和标志。文学理论家奥伏恰连柯指出:“拉斯普京、别洛夫、阿勃拉莫夫、舒克申和其他‘农村题材’作家的作品问世,开始了俄罗斯作家的艺术散文中的新时代。”^①

一九三七年,瓦连京·格里高利耶维奇·拉斯普京出生在伊尔库茨克州安加拉河畔上的乌斯特—乌达村。一九五九年,他毕业于伊尔库茨克大学的历史—语文系,之后在西伯利亚的几家地方报社工作。拉斯普京在回忆自己最初的创作历程时曾经这样说:“大学语文系毕业后,我便去报社工作。伊尔库茨克是一座文学城市,在那里我们所有的人都写作,所以我也试了试。我并不是一下子就成名的,但是我最终还是成

^① 见《拉斯普京文集》(两卷集),加里宁格勒,琥珀故事出版社,2001年,第3页。

功了。我认为,这是由于我在安加拉河和原始森林旁的乡村度过的童年充溢着我的心灵的缘故。”^① 一九六一年,他在《安加拉》丛刊上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短篇小说《我忘记了问廖什卡》(1961),他的这个作品写得并不成功,因此,此后四年内他没有写任何小说。直到一九六五年,他才重新开始了小说创作。六十年代后半期,他创作了《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1965)、《天涯海角》(1966)、《新城篝火堆》(1966)、《出售熊皮》(1966)和《瓦西里和瓦西里莎》(1967)等短篇小说。一九六七年,拉斯普京写出了中篇小说《给玛丽娅借钱》,这部小说让他一举成名。

七十年代,他创作了《最后的期限》(1970)、《活着,可要记住》(1974)、《告别马焦拉》(1976)几部以西伯利亚农村为背景的小说。这几部作品塑造出几位保持着俄罗斯人民的传统道德观和价值观的俄罗斯农村妇女形象,这些作品以深邃的思想、鲜明的形象、细腻的心理、多彩的象征和深刻的寓意赢得了读者的青睐,给作家带来了巨大的声誉。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拉斯普京发表了《伊尔库茨克与我们在一起》(1979)、《贝加尔湖啊,贝加尔湖!》(1981)、《活到老,爱到老》(1981)、《娜塔莎》(1981)、《把什么转交给乌鸦?》(1981)等作品。拉斯普京在这些作品中运用一些非理念的情节,描述人类存在的神秘,探讨人生现象与大自然的联系,指出人应当完善自己,应对自己的精神和道德的堕落负责任,作家的这些思考引起读者深刻的思想共鸣。一九八五年,拉斯普京创作了政论体小说《失火记》。这是他对俄罗斯农村生活

^① 邦达连科与拉斯普京的谈话,见《俄罗斯文学之日》一书,莫斯科,帕列亚出版社,1997年,第110页。

的变化和俄罗斯人道德退化的深入观察的结果。小说因敢于暴露苏联社会中的阴暗面、揭示苏联社会的弊端而引起前苏联社会的广泛注意。有的评论家认为,《失火记》与《告别马焦拉》这两部作品都描写苏联社会生活中的灾难性事件。马焦拉岛沉入河底是外部世界的变化带来的残酷后果。马焦拉村的老一辈居民与马焦拉告别是一种灾难。人们离开了马焦拉进入一个特定的时空环境和历史环境。在这种环境里,进步与道德、生活的意义等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和尖锐。在《失火记》里,拉斯普京以政论家的激情描写了发生在森林农场的一场大火。房屋和仓库被毁,这场火灾是一场真正的灾难,大火也把人们抛到一个新的时空环境之中,这场灾难把这个村庄的生态状况暴露无遗。因此,这两部小说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

八十年代后半期苏联社会的变革,尤其是九十年代初苏联的解体在拉斯普京在思想上引起了强烈的震撼,苏维埃国家的陨灭让这位作家的小说“失语”了。拉斯普京有近十年几乎没写什么小说,但拉斯普京在这个时期并没有停笔。他拿起了政论武器,写出了一系列有关道德、生态、文学的特写和文章。拉斯普京像托尔斯泰写出了《我不能沉默》,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出《作家手记》,契诃夫写出《库页岛》等具有强烈政论风格的作品一样,用自己的政论作品为俄罗斯的前途担忧,为人民的命运呐喊。表现了他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意识。

苏联解体后,作家阵营迅速发生了分化。有的作家丢掉了自己过去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对以前的东西一股脑地予以否定;有的作家坚持自己原有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坚守自己的阵地战斗不止。从拉斯普京九十年代创作的一系列短篇小说来看,拉斯普京属于后一种作家。《谢尼亚上路了》、

《邻里之间》、《在医院里》、《悼亡者日》、《女人间的谈话》、《突如其来》、《傍晚》、《幻象》、《新职业》、《农家木屋》和《在故乡》等作品在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九年陆续问世。这些作品表明,拉斯普京不跟随社会风向,不背弃自己的信仰,不丢掉自己的原则,不辱自己的作家使命。他像从前一样保持着高度的公民感和责任感,像勇敢的斗士捍卫俄罗斯传统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并把俄罗斯民族的复兴希望寄托在东正教信仰上。拉斯普京的这些短篇小说问世表明他重返文坛,也标明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因此,俄罗斯文学评论家卡金采夫欣喜地说:“一个新的拉斯普京出现了。”

在俄罗斯,对当今的俄罗斯社会现状有的人肯定,有的人否定;有的人欢呼,有的人痛心。拉斯普京冷静地观察俄罗斯社会和现实中光怪陆离的现象,用“灾难性的思维”看待俄罗斯社会的巨变,全方位地描述社会转型给人民的生活和心理上带来的灾难。对俄罗斯现实社会的一切——从臭名昭著的私有化到掠夺国家财富的黑社会,从新政权出台的各种政策到各种丑恶的社会现象——进行批判和否定,如,当谈到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社会状况时,拉斯普京以一种讽刺调侃的口吻指出,昔日的大自然、土地、城市、村落虽然存在,但已经是另一番景象。“……虽然她(指巴舒达的母亲)居住的那个村子还继续存在于苍天之下,可已经属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在那里,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村苏维埃、商店、医务所、学校都不复存在——在新秩序下,这一切都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个村子完全放任自流了,无人管理,它彻底打碎了长期以来套在身上的枷锁,除掉了所有的羁绊——爱到哪儿就去哪儿吧!愿意的话——宣布成立自己的独立王国;愿意的话——可以让中国去管辖。”(见小说《下葬》)拉斯普京的批判的深度

和否定的坚决是前所未有的,并且对俄罗斯现实社会的批判和否定构成了拉斯普京九十年代小说的基调和激情。

在上个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的创作中,拉斯普京也对苏联社会进行批判和抨击,可九十年代他的批判和抨击的性质比起以前有着本质的不同。如果说他过去作品的抨击和批判针对的是社会现实中的某些个别的弊端和局部性的丑恶现象,目的是为了帮助苏联社会的改造和完善;那么九十年代他的小说对俄罗斯社会的揭露、批判和抨击是全面的和彻底的,其目的是要否定现行的社会体制和社会秩序。

拉斯普京注意到如今俄罗斯社会中的弱肉强食的现象。他在小说《突如其来》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如今既没有聪明人也没有傻瓜,只有强者和弱者,只有狼和羊。”强者巧取豪夺,弱者任人宰割。强者可以颐指气使,为所欲为;弱者只能惟命是从,俯首称臣。在狼和羊之间没有什么道理可讲。这就是俄罗斯的现实。短篇小说《下葬》^①就对这种弱肉强食现象做了艺术阐释。巴舒达是一位典型的、处在俄罗斯社会底层的弱者。她的母亲去世了。应当把母亲安葬,可安葬母亲成了难题。因为按照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人的风俗习惯,安葬死者要经过为死者洗身、穿衣、入殓、守夜、为亡灵安魂等过程。然而在如今的俄罗斯这每一步都需要数额惊人的钱财,这令巴舒达这位无钱无权的退休女工大伤脑筋。与其说巴舒达为失去母亲而悲痛,莫如说她为无能力安葬母亲而伤心。无奈之中,她决定自己安葬母亲。在一位熟人的帮助下,趁着

^① 这是拉斯普京在九十年代发表的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作家在多年的“沉寂”后重返文坛的标志。小说发表后立即引起评论界和读者的注意。小说问世第二年(1996),获得首届“莫斯科—彭内”国际文学奖。

夜色把母亲偷偷地抬出城,埋在离城不远的一块林中空地上。巴舒达把母亲送往彼世的每一步,都有悖俄罗斯人的东正教信仰和风俗,但对于手无分文的巴舒达来说,这是她的惟一办法。拉斯普京没有描写巴舒达的痛苦一生,而仅仅撷取巴舒达为自己母亲办理丧事这一生活片断,淋漓尽致地描述出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给巴舒达这位弱者的生活、心理带来的痛苦。人们不禁要问是谁造成了巴舒达的人生困境和悲剧?回答是不言而喻的,是弱肉强食的俄罗斯社会使巴舒达这样的普通工人堕入社会的底层,把她推到无出路的境地。这部小说在对当今俄罗斯社会的批判力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作家以前的任何一部作品,显示出作家拉斯普京的胆略和勇气。

社会的弱肉强食现象导致了贫富两极分化。许多穷人只好走上街头行乞。行乞本身就是一种可怕的社会现象,更为可怕的是它还会衍生出种种犯罪行为。小说《突如其来》就是描述俄罗斯社会的这种现象的,小说通过谢尼亚在人生道路上的一次出乎意料的奇遇,对当今的俄罗斯的行乞现象以及由此衍生的贩卖儿童现实进行了揭露和抨击。《突如其来》是拉斯普京“关于谢尼亚·波兹德尼亚科夫的系列短篇小说”中的一篇。谢尼亚是位普通的农民,流浪汉。他勤劳、善良、富有同情心,“一个没有害人之心的庄稼汉,一副热心肠,总是笑呵呵的”。但是俄罗斯社会的巨变令他跟不上生活变化的节奏,他有一种失落感,感到伤心,甚至痛苦。但他“有一股战斗的豪气”,与生活抗争,想抓住生活中的某些东西,“想看一看这里的事情最后是怎么结局,看我们能不能把这些败类赶走”,可又力不从心。这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学中的一个新的典型形象。《突如其来》的故事发生在西伯利亚的安加拉河

的河畔。主人公谢尼亚与自己的几位乡亲准备回乡,因为轮船误点而滞留在安加拉河渡口,在他等候轮船的时候,见到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被一位妇女带领着。他认出那个女孩就是昨天他在集市上见到的那位自称没有母亲的女孩,谁也不知她栖身何处。今天,谢尼亚与这个小女孩在安加拉河畔的再次相遇引起了他的兴趣。他想弄清小女孩的真实情况。后来他从那位带领小女孩的妇女口中得知,小女孩名叫卡嘉,那位妇女叫柳霞,她并不是女孩卡嘉的母亲,而是临时收留女孩的好心人。谢尼亚十分同情她们的境遇,所以决定收留她俩,准备把她俩带回自己的家乡。柳霞是人贩子,她一看事情行将败露,便丢下了卡嘉溜之大吉。谢尼亚只好把卡嘉带回自己的村子,说服妻子收留了卡嘉,教育她适应新环境的生活。但好景不长,有一天,突然来了几个人,一位自称是卡嘉舅舅的男人,反咬一口说谢尼亚偷了小女孩卡嘉,所以强行把卡嘉带走了。故事到此结束了。小女孩卡嘉今后的命运如何?是否又落到了新的人贩子手中?不可得知。读者只能去猜想了。

在当今俄罗斯城市和乡村,甚至有许多儿童流浪街头巷尾行乞,看到令人十分辛酸。更令人痛心的是,有的行乞儿童饿死冻死街头,有的行乞儿童被人贩子当成商品骗卖……让人感到俄罗斯似乎又返回到农奴制时代去了!因此拉斯普京为小女孩卡嘉的悲惨命运发出感叹:“主啊,这究竟是世上的什么事啊?!上帝是否看到了?也许,这是他,是上帝从自己的身边派来了这个天使般的造物,以获得一种纯粹的证明?”在这部作品中,拉斯普京还批判俄罗斯的教育状况。因为他认为教育政策的失误也是造成大批儿童失学、行乞的另一个原因。“……一切教育都被无缘无故地丢掉了。我们的教授或是奴才,或是走狗。”学校处于一种无人管理的状态,学校的

质量下降,教育的方法不当,教育系统的自由化成灾……更可怕的是,教育成了为俄罗斯新贵服务的工具,不少学校变成了贵族学校,实行外汇的收费法,专门为俄罗斯新贵的子弟开放,把大批的普通人家的子弟排除在校外。在这种情况下,“学校死盯着,不让一个孩子失学,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今,你就是完全不让孩子去上学,也没有人来过问。”因此学生的流失也就毫不奇怪了。在谈到如今学校教育中的种种不正常现象时,拉斯普京完全以一种讽刺的语调,调侃的口吻。比如,学生因迟到而要被罚巨款,“在师范专科学校里,每旷一次课,每得一个二分都要罚款——而且是成千成千卢布地加码。乌申斯基们和苏霍姆林斯基们在自己著名的教育体系里都没想出这一点。要想提出这些做法,需要涌现出一批大胆坚毅、具有恢宏的国务气魄的思想家。瞧,这些人的时代说来就来了”。如今,俄罗斯的高等学校教育滑坡,可学校的名字却不断升级:中专变大专,大专变学院,学院变大学,大搞一些假大空的事情。对如今这些改头换面、所谓的大学拉斯普京不无嘲讽地写道:“大学……是啊,那时候城里只有一所大学,而且是名副其实的大学。可如今任何一所技校,任何一所培养纨绔子弟的中专都叫成大学。好像把别人的名字偷来自己的学问就增加了似的。”

电视、报纸是当今世界上的重要传媒工具。但是拉斯普京对当今俄罗斯的电视、报纸十分不满,予以彻底的否定。这点在他的许多小说中都有所表现。小说《在医院里》的情节平淡无奇。主人公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诺索夫是位林业部的干部。他的身体不好,前后一共做了四次手术。由于最后一次手术的缝合线开线而再次住院。故事就是从 he 住院展开情节的。小说通过他与自己的同病房的病友,一位名叫安东·伊

里奇的大型建筑联合企业的总经理的交谈,展示出他们对俄罗斯社会现状的不满。诺索夫的这种不满甚至转到对当局控制的传媒工具——电视的痛恨。他认为他们“霸着这个东西胡说八道,侮辱我们这些人……”“他(指电视主持人)长得女里女气,一副公鸭嗓子,扭捏作态地耸动着两个溜肩膀,在屏幕上像夜莺一样奢谈私有化的好处。”那么,电视屏幕带给观众的是些什么东西呢?带色的广告:“从电视机屏幕深处就像从隧道中一个接一个向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飞过来几个赤身裸体的姑娘。她们的两腿前伸,个个像巨大的猛禽,在飞来的最后时刻还饥饿地叫着,编出一套带着图像的广告词……”不健康的、甚至是肮脏的内容:“通过电视塞给我们的是什么音乐?难道植物会在这种音乐下生长吗?电视上给我们展现的是怎样一些嘴脸?若把蓖麻放在电视机前——蓖麻也会立刻晕过去!而且,在那里还常常是一丝不挂的!”平头百姓所听不懂的东西:一帮傻瓜在电视屏幕上又蹦又叫,连他们讲的话都不像俄语。所以,娜塔利娅(《傍晚》的女主人公)问自己的女邻居:“娜佳,我问你是不是哪儿有个键,让人按一下就能听懂俄语?可是没有哇。”电视上讲的话让普通的老百姓都听不懂,这是对俄罗斯当今的电视宣传的一种莫大的讽刺。在小说《谢尼亚上路了》里,主人公谢尼亚、他的妻子加里娅乃至整个扎莫雷村的庄稼汉们对电视节目都持否定态度,因为“它带来的尽是坏东西”,电视上除了鼓吹所谓的民主就是播放色情淫秽的镜头,这不能不让谢尼亚及其村民们感到失望和痛心。为此,谢尼亚还给国家电视台写信反映问题,他亲自去了莫斯科一趟,向叶利钦告电视台的状,但莫斯科给了他一次很好的“教育”,他与电视台的抗争宣告失败,只能把自家的电视机除掉,作为了结。

《在医院里》的主人公诺索夫对俄罗斯的一些报纸也同样持否定态度，称之为“敌人的宣传”，“读了只有害处”，因此他拒绝看那些报纸。主人公在列举了俄罗斯当局的一系列罪行之后，指出他们（当局者）“一个比一个放肆，一个比一个自私”，“他们毫无廉耻、昧了良心地把国家洗劫一空，又来愚弄我们……”因此他认为如今的当权者把俄罗斯带向苦难，“他们不是建设者，他们不会建设。搞破坏是他们的职业，是他们的才能所在！他们就有这种本事”，当局者“借其所能把污泥浊水都泼到俄罗斯身上，在俄罗斯大地上搞了一些从来没有的制度，往身上披了一层他人的皮”。“他们……要愚弄您我这样的人。可我们还惊叹地咧开大嘴，认为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于是，主人公大声疾呼：“上帝，拯救我们吧！”看来，他把拯救俄罗斯的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这部小说一方面表达出作家对俄罗斯现状的不满，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对俄罗斯前途的忧虑，充分表明拉斯普京是一位具有高度爱国心和公民感的作家。

拉斯普京的目光不仅仅停留在俄罗斯乡村，他还对俄罗斯的社会转型期的城市知识分子的命运十分关注，小说《新职业》就是描述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生存现状的。小说主人公阿廖沙·科列尼奥夫在苏联时代曾是位大学的高材生，一位有成就的青年物理学家，正当他踌躇满志，要大展鸿图的时候，苏联解体了。苏联解体后，大量的科研机构解散关闭，科学成为无用之物，阿廖沙本人也成为无用之人。这位青年科学家“在人到中年的时候，却变得一无所有了”。过去，在“某个地方还曾经有过他的志向，他的工作，他的俄罗斯——可如今乱世让它们都变得支离破碎，荡然无存……”这时候，她的妻子也离他而去。“他俩的离婚日子正好赶上国家、土地、信仰、历史、

法律和观念——这一切都在分崩离析、分化瓦解的时候。这样一来,他俩的家庭解体是伴随着那种让半个世界都垮台的崩溃而来的,因此就毋需过问他俩在家庭内部的谁是谁非了。况且就是过问又有什么意义呢?一切都土崩瓦解了。当一个千年即将终结,另一个新千年即将开始的时候,生于不同星座的人们却互为仇敌,普遍的恐惧让所有受命运的拨弄、在这些星座下诞生的人都失去了理智。”在国家解体的总体氛围下,他俩的婚姻破裂就不足为怪了。阿廖沙为人诚实、善良,说话很有分寸,像他这样的性格和为人在当今的俄罗斯社会里很难找到工作,施展自己的才能。后来,他好不容易通过自己的熟人,在他昔日大学的一个又脏又暗的楼角的学生宿舍栖身,重新开始了自己的生活。说来可笑,阿廖沙的新职业不是什么别的工作,而是给俄罗斯新贵的婚礼餐桌上说祝酒词。阿廖沙凭着自己的才智,编出各种各样动听的、富有人生哲理的祝酒词,博得俄罗斯新贵们的欢心,以此找到了糊口的方式。这对一位有才华的青年物理学家是多么滑稽的和可悲的“职业”啊!这简直是对科学的极大嘲弄!然而这就是许多俄罗斯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现实。阿廖沙别无选择。当今俄罗斯知识分子要想生存,要么远走他乡,去西方世界打工,要么与现存的社会相调和,二者必择其一。拉斯普京把九十年代留在俄罗斯国内的知识分子的贫困处境和无力抗争的状况描绘得淋漓尽致。

拉斯普京具有强烈的生态意识,人与生存环境的关系一向是拉斯普京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他的《告别马焦拉》和《失火记》等作品对这个问题已经作过探讨。九十年代,拉斯普京继续深入探讨人与生存环境,人与大自然的关系问题,把保护生态环境提到人的道德伦理范畴的高度。

小说《农家木屋》可视为《告别马焦拉》和《失火记》的续篇。《农家木屋》中的农家木屋像马焦拉岛一样，是俄罗斯宗法制田园生活的象征。阿加菲娅住的“小村清洁而又整齐，一条小河从村边蜿蜒而过，从村子的两边都一眼就看见安加拉河，因此，人们都喜欢克里沃鲁茨卡亚”。女主人公阿加菲娅对自己的故乡、木屋有着深厚的感情。但现代生活的方式破坏了这里村民的生活，“有地方可逃的人全都逃走了。这是一方被抛弃的土地，一方被榨干的、被掠夺的、被摧残的、被抛弃的土地”。有的人虽然留下来，也被迫从事起其他的职业，使得大片农田荒芜了。这里不禁要问，人这样做道德吗？阿加菲娅死了，“木屋成了孤儿……木屋没有生气地挺了一冬——没有炊烟，窗户紧闭，死气沉沉，无人照看，显得冰冷而忧伤。”后来，她的木屋里又住过几家人，但在乡村荒芜的总体背景下，人们在这里是不会久呆下去的。最终，这座木屋毁在一对醉鬼男女手里，他俩在酗酒后将木屋内部烧得荡然无存，只剩下一个空空的外壳了。这个木屋的历史是阿加菲娅的悲剧人生的见证，也是俄罗斯当代生活悲剧的缩影，是人类残酷地对待大自然的后果。因此拉斯普京写道：“在这里，在阿加菲娅的园子里，是可以思考一些问题的，从这里可以看到，整个世界都累坏了——它看上去如此疲惫，甚至连她的欢乐都被抹得一干二净了。”人与环境的关系的破坏问题不仅在阿加菲娅生活的村子存在，也在俄罗斯的其他农村存在。小说《傍晚》里有这样一段话：“这河里的水已经无法饮用，已经不能到河里去洗澡了……是人们将它变成一个巨大的、丑陋的、肮脏的水湾，也就是所谓的水库，是人们使它丧失了它一直边走边唱的那清脆、婉转的歌声。”小说《在故乡》里，故乡也呈现出一片“荒凉和衰败”，在拉斯普京的眼里，《农家木屋》中的那间农

舍,《傍晚》中的那条小河不仅仅是一座房屋,一条小河,而是俄罗斯传统的、神圣的农村生活的象征。农家木屋被毁,小河被污染就意味着生态环境的破坏,是一种灾难性的后果。所以作家通过自己的小说《农家木屋》发出呼吁:人们要保护自己的家园,保护自己的生存环境,否则,就是人性和道德的沦丧。当然,拉斯普京重视人与环境和生存环境的保护问题,并不笼统地反对科技的发展和进步,他只不过是提醒人们,“要注意人类存在的根基”。“为了在文学里能够出现新的普希金、费特、屠格涅夫、布宁、普里什文、卡扎科夫和诺索夫这些俄罗斯大自然和俄罗斯心灵的歌手,——难道我们所有的人今天不应当在一起关心一下心灵和大自然的保护问题吗?”^①拉斯普京的这种呼吁在当今得不到应有的回应。可作家坚持自己的信念,不断地提醒社会和人们注意,表现出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执著精神。

在苏维埃时代,无神论是苏联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但它也没有把东正教信仰从许多俄罗斯人的心中彻底赶走。在文学里,东正教思维作为一种道德范畴,在许多作家的创作中表现出来。拉斯普京就是这样一位作家。我们发现,拉斯普京在七十年代的许多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几乎都是具有东正教情绪的老太婆。从八十年代中起,俄罗斯开始了宗教复兴运动。宗教复兴影响到俄罗斯作家的创作和文学发展进程。九十年代,拉斯普京的思想急剧地向宗教靠拢,一九九一年,拉斯普京在俄罗斯民族集结大会上发言,号召巩固东正教的团结,认为离开信仰关于道德性的一切谈话和一切美好的号召都是空

^① 邦达连科:《现实的文学》,莫斯科,帕列亚出版社,1996年,第110页。

洞的、无意义的。最近十几年，拉斯普京愈来愈认识到东正教在每个俄罗斯人和整个俄罗斯民族生活中的作用，他把俄罗斯社会的振兴和人民的未来寄希望于东正教。一九九七年，他在回答《文学之日》报的主编邦达连科的采访时说：“我理解信仰对俄罗斯人的必要性。离开了东正教，俄罗斯人就不是完全的俄罗斯人，也许，完全不是俄罗斯人。”^①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拉斯普京把东正教思想注入自己的作品内容和人物形象中，并且说，“如果发现我的散文作品有信仰东正教的人的世界观，我将感到高兴”^②。

小说《女人间的谈话》实际上是一场信仰与无信仰、道德与无道德的争论。作家在讲述西方化的年轻一代与恪守俄罗斯民族道德传统的老一辈人之间对立的故事。小说中仅有两位主人公——孙女维卡和奶奶娜塔利娅。孙女是被所谓的西方文明毁掉的一位青年。她没有任何信仰，不受任何道德的约束，却有强烈的现代意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希望做一个领军女性。正因如此，她受到了生活的惩罚。奶奶娜塔利娅是一个地道的俄罗斯农村妇女，她信仰上帝，恪守东正教传统的道德观念，希望上帝帮助俄罗斯摆脱包括发生在自己孙女身上的种种邪恶。她与孙女的谈话是信仰与无信仰的两种道德观的较量，尽管这场对话十分艰难，娜塔利娅未能说服孙女，但她的信仰显然已经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她已经取得了道德上的胜利，这正是作家拉斯普京创作这个小说的宗旨所在。小说《下葬》同样暗示出如今“信仰对俄罗斯人的必要性”。女主人公巴舒达本来不信教。但是，俄罗斯社会生活的现实让她明白，人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就必须信教，

①② 邦达连科：《文学之日》，莫斯科，帕列亚出版社，1997年，第112页。